

[文学与文化研究]

贺瑞麟德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王长坤,王军丽

(西安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54)

摘要:晚清陕西三原儒士贺瑞麟理学思想的产生和流变,从侧面反映了程朱理学在晚清时期的发展状况。在搜集和整理有关贺瑞麟德育思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探讨了贺瑞麟德育思想的孝悌教育、品行教育、挫折教育、女子教育和立志教育等五个方面的内容。贺瑞麟德育思想尽管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对我们今天的德育教育仍具有其当代价值。

关键词:贺瑞麟;德育思想;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I20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2914(2018)05-0094-05

He Ruilin's Moral Education Thoughts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

WANG Changkun, WANG Junli

(School of Marxism, X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Xi'an 710054, Shaanxi, China)

Abstract:He Ruilin was one of a Confucian scholar of Sanyuan in Shaanxi Province in late Qing Dynasty. The generation and theology of his thoughts reflected the development of Cheng Zhu's neo-Confucianism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On the basis of collecting and collating the literature on He Ruilin's moral education,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contents of He Ruilin's moral education, such as filial piety education, character education, frustration education, women's education, and aspiration education. Although He Ruilin's moral education thoughts have its historical limitations, it still has its contemporary value to our moral education today.

Key words:He Ruilin; moral education thoughts; contemporary values

贺瑞麟(1824—1893),晚清时期关中地区颇负盛名的理学家、教育家、书法家。贺瑞麟生逢衰世,世风、士风、仕风日下,吏治腐败,社会黑暗,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更是千疮百孔、危如累卵。贺瑞麟是一位以程朱为尊,并以倡导张载礼教为己任,延讲古礼、教化风俗的儒者。他渴望正学术、正人心,从而正世风。于是他花了近三十年的时间投身教育事业,为关中的教育事业做出巨大贡献,他以教育作为保国强民的手段,用毕生的心血为我们今天的德育教育换来了宝贵的经验。

1 贺瑞麟生平及思想

贺瑞麟,名均,字角生,号复斋,清末西安府三原县人。其父贺含章,一生且医且商。贺瑞麟八岁读

《四书》,九岁读《诗经》。年十七入庠序,食廪饩,别学术、辨异同。年十八中秀才,二十岁应乡试,一举夺魁,名播乡里。道光二十七年(1847),二十三岁的贺瑞麟拜朝邑名儒李元春为师,自此“于周、程、张、朱书无不悉心究极,益愤志圣贤之学”。^{[1][127]}咸丰三年(1853),年届而立的贺瑞麟已为饱学之士,然几次科考,屡举不售,于是筑麻庐于父墓之侧,名其“有怀草堂”,正式走上亦读亦教的治学生涯。贺瑞麟潜心治学,儒业精湛,尤其景仰和推崇朱熹之学,其“生平著述,一言一字无不与朱子相发明”,^{[1][177]}且终生严于学术门户之辨,对汉学、举业、阳明“良知”之学辨之尤严。同治元年(1862),贺瑞麟举家迁往山西绛州,常与杨损斋朝夕相聚,谈论学问之道。此外,与杨损

收稿日期:2018-05-25

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16JZ046)。

作者简介:王长坤(1970—),男,陕西西安人,西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思想文化。

斋校正《小学》《近思录》。同治三年(1864),贺瑞麟归陕,助知县余赓阳乱后重建,重修邑志,清丈土地,殚精竭虑。

同治四年(1865),贺瑞麟主讲学古书院,同治九年(1870),在门生刘东初的协助下,于鲁桥北门外购置清凉山坡地数十亩,建窑洞十余孔,收授生徒,并命名其“清麓精舍”。光绪七年(1881),县令焦云龙助其重修扩建“清麓精舍”,并常以学子身份前去听讲。另设(木板)印刷局、藏书洞三处。书院一改重功名之沿习,以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2]2524}的理念为办学宗旨,由抚军谭云鹄命名为“正谊书院”。正谊书院成就斐然,名播关中,为关中四大书院之一。贺瑞麟训迪诸生,诲人不倦,主掌书院期间所执行的管理制度异常严格,“关中自横渠以来未之有”。^{[1]1071}正是对于为学求道的执着与坚韧吸引了众多四方来学之士,其学术虽未开风气之先,但在清末理学已陷低沉的情况下,颇有重振之功。光绪十九年(1893),贺瑞麟猝然谢世,享年七十岁。

针对清道光至光绪年间学术思想上虽然仍以程朱理学为主,但是因为科举之风所袭,时人津津于辞章利禄之学、功利之心泛滥、世道人心不古的思想态势和学术之弊,贺瑞麟以“以变末俗”正人心为追求,继承和弘扬程朱理学,力辟佛老、陆王心学。^{[3]461-478}

贺瑞麟继承和弘扬程朱理学,他一生“谨守程、朱主敬穷理之训”,^{[1]1072}“一惟程、朱是守”。^{[1]251}在理气关系上,贺瑞麟认为“气如卒徒,理如元帅”,^{[1]885}天地间聚散、育化,虽然都表现为气的运动变化,但其中贯穿的“所以然者”则是“理”。如果仅仅看到气之聚散变化而不能意会其间的“生生不息之妙”即理,那就可能堕入“释氏所谓一大轮回”^{[1]186}的误区。在这里,贺瑞麟与程、朱都是从形而下的角度理解太虚与气的关系,坚守程、朱的立场。贺瑞麟还继承了朱熹“理一分殊”的思想,认为“张子《西铭》道理与墨氏兼爱绝不同,惟明辨深察而本乎天理之公,无一毫人欲之私,则天德王道全矣”。^{[1]1019}强调“理一”与“分殊”不可偏废,举例说:“仁是理一,义是分殊。忠是理一,恕是分殊。”^{[1]1036}在心与理、心与性的关系上,贺瑞麟恪守程、朱以“理”为本的思想,认为“心非理而为理之总会,心亦气而为气之精英”。“心具理谓心即理则不可,理非气亦无承载处,认气为理则不是。”“心之主宰者,以其具是理而已,所谓本然之心是也,则即以理为心之主宰亦可。”^{[1]1034}他考察了明代以来

学术思想的发展概况,强调朱子之道的必要性,认为朱子的著作是为“千古学孔子者立之标准”,故“盖求孔子必自求朱子始”。^{[1]63}他指出朱子学说是孔、孟、程、朱之道的嫡传,认为尊崇朱子之道,才是学术的真正之道,所以贺瑞麟谨守孔、孟之心法,“以荡检踰闲为可耻,乞墦登垄为可羞”,深明朱子之道,^{[1]10}对陆、王之心学极力排斥。贺瑞麟还继承了张载关学力辟佛老的传统,认为“人事之修在于讲明正学”,而“所谓正学者,亦不外四书、六经之旨,孔、孟、程、朱之言”。“若外此而讲学,夹杂二氏之说,则惑世诬民,充塞仁义,更有甚于杨、墨。”^{[1]378}贺瑞麟认为佛教是“邪说”,其中之一就是讲“地狱之说”,他指出此说其实是为恐吓“下根之人”而令其为善的说教而已,并不具有真理性。^{[1]188}

2 贺瑞麟德育思想的内容

贺瑞麟思想中含有丰富的德育内容,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而这五个方面的德育内容也正是现代教育所忽视的。

第一,孝悌教育。“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4]232}贺瑞麟也认为:“要知教家乃教国之本,而修身又是教家之本,故注云‘身修则家可教矣’。”“所以教家处不外孝弟慈,仁与让也是孝弟慈。其蔼然有恩以相爱处,便是仁。其秩然有礼以相接处,便是让。帅天下以仁,仁也是孝弟慈。盖他所以能孝弟慈处,皆本于恳恻之心也。贪戾是仁让之反,暴是仁之反。”^{[1]963}他极推崇孝悌之道,“学者须是心心念念,专以入孝出弟守先待后为事,方不空吃人间饭。若无这个心,区区只从自己一身一家温饱上起见,纵吃自己饭也不免于素餐。须将这意思常自警惕,不可只做一场好话说了”。^{[1]929}在他看来,正是因为有孝悌之道的存在,中原文化才能成为正统文化。“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以来,只这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即祇此亲义序别信,亘古亘今此理不能磨灭。中国之所以愈于夷狄,以中国能讲此道理。圣贤之所以异于庸愚,以圣贤能尽此道理。学者学此也,问者问此也,思者思此也,辨者辨此也,行者行此也。须是一一反之于身,讲学乃不空谈也。”^{[1]959}贺瑞麟认为出现刁民的原因就是当地的父母官没有做到以身作则,教民以孝悌之道。

第二,品行教育。首先,重榜样示范。贺瑞麟继承了儒家注重自身品格修养的思想,认为“取人当观其根柢如何,不可专取其才。若根柢不善,虽有才亦

靠不住。大凡才德兼全,上也。不得已,应取德而轻才”。^{[1]907}他不仅注重自身的修养,更注重以身作则,严于律己,身体力行儒家伦理道德的教诲,真正做到了将外在的学问形式转化为内在的道德修养。因此,后人给予了他高度的评价。其次,贺瑞麟还提倡诚信。信,作为儒家“五常”之一,是中华民族优秀的道德品质。“信的基本要求是对人诚实不欺,这与诚是一致的。所以诚与信是相通的。”^{[5]199}《论语》中有一段很著名的子贡问政,当子贡问孔子如何治国时,孔子认为“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贺瑞麟特别提到了《论语》中的“子贡问政”,他说:“子贡问政章说去食去兵,不必即有此事,却是实有此理。圣门之学都是要穷理,所以每每设疑致难。子贡岂不知信不可去,只是与食相较便有些难决处。圣人才说去食,似乎骇人,及说出‘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两句,又却是个极平常底道理。可见人宁为有信之死,不为无信之生。又可见天下极难事,圣人处置只是一个理,更无别法。”^{[1]917}诚信在贺瑞麟看来是比生命还重要的东西。

第三,挫折教育。纵观贺瑞麟的一生,屡受挫折,人生四大悲剧都发生在了他的身上。道光二十五年(1845),其父贞堂公去世。道光二十六年(1846),其母谢世。咸丰四年(1854)其妻张孺人逝世,接着“戊子二月四兄巡检公堤卒,先是壬申之春先生率家人山居。癸酉又至,时子铭照七岁,女肃年未及笄。元宵先生方读书,林孺人抱女醺坐听,铭照、女肃且以醺相戏,先生愿而乐之,赋诗曰:‘厌观灯火听笙箫,独向山中坐寂寥。内子听书儿女笑,人间无此好元宵。’其年六月铭照殇,次年乙亥子肖陆生襁褓而殇,女醺五岁而殇,女肃嫁三年而歿。杨孺人、张孺人各举一女,俱早殇。昆仲五人……两世所存惟先生及其三兄一子伯箴而已。”^{[1]1076}在当时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社会环境下,没有儿子继承家业是大不孝。“先生年高无子,侧室刘竟连生三女,众皆郁郁不乐。先生曰:‘天亦试人,往往加一拂逆事,再加一拂逆事,以验如何。此时正要动心忍性。’”^{[1]983}虽然他才智过人,弱冠聪颖好学,但是在二十六岁时,“四月试拔萃科,一时无出先生之右者,然竟报罢,秋闱又报罢”。^{[1]1137}即使命运百般戏弄于他,他依然没有放弃对学问的追求,他在回复哥哥的信中说道:“同在天地间,幸生而为人,便与鸟兽草木不同。又幸生而为男人,便与妇人女子不同。又幸生而为读书人,更与农工商贾不同。若不发愤誓必为圣贤,不

但不能增光父母,正恐玷辱父母。当此时,志向坚定,持一甘受穷困之心,任是许多艰难,许多困苦,总不能摇夺这个志。”^{[1]982}他在《答高维岳书》中云:“人须从烈焰严冰中试一试,方耐寒热。不然稍不如意,便寒也怕热也怕。”^{[1]883}他认为“大丈夫须有百折不回之概,然后可以当大任,一撞百碎何足言?”^{[1]1011}真正体现了张载的“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女于成也”(《张子全书·西铭》)奋发进取的人生态度。正是这样的人生态度,支撑着他走完了艰难的一生。

第四,女德教育。在以“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为指导的“家国同构”时代,特别重视对女子的教育。“积家而成国,家恒男妇半。女顺父母,妇敬舅姑,妻助夫,母长子女,姊妹娣姒,各尽其分。人如是,家和;家如是,国治。”^{[6]14019}贺瑞麟作为晚清理学家之一,在自己躬行道德伦理的同时,更致力于女德教育,以求敦厚风化、化民成俗。他认为“古女子皆有教,女教亦今日要事”。^{[1]881}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妇女们开始接受新鲜事物,抛头露面,穿梭于各种社交场所,妇女们的这些变化,无疑是与理学思想家们所塑造的那些贤淑、端庄、自重等妇女形象背道而驰的。这些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又刺激了像贺瑞麟这样的以“正人心,厉风俗,兴教化”为己任的大儒贤达著书立说来教导妇女。于是《女儿经》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了。《女儿经》一书修订于同治三年(1864),贺瑞麟在《跋文》中称:“宜堂张君次女聪慧甚,君亦最钟爱,尝教之读书,字侍御梁君义初子永泉,嫁有吉日。愧无以为奁赠,旧藏《女儿经》,不知撰者姓名,而语最明晓,易记诵,略加改正遂书与之。”^[7]《女儿经》全文共一千四百二十四字,分为女德、女容、女言、女功四个部分,即四德。贺瑞麟所著《女儿经》是以预防“闺门之教不先,而伦常因以衰薄,女妇未闻训诫,虽贤者质美,罔知大义”。^[7]从而维护伦理纲常,以达到凝聚家庭、稳定社会的目的。

第五,立志教育。贺瑞麟毕生以复兴程朱理学为己任,在他看来学贵立志,有志者事竟成。所谓“立志”,就是要加强道德修养,并以古代圣贤为楷模,树立明确高尚的理想。“立志不定,东撞西撞,无个着落,终会堕落坑堑,况无志乎?”^{[1]1028}人处在天地之间,与天地并立为三,贵为万物之灵长,没有为圣贤的志向,怎么敢与天地并驾齐驱呢?“立志如人在战阵,雷鼓一鸣不杀贼,则为贼所杀,又安得不向前。”^{[1]1050}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时,潜能就被激发出

来,也只有抱定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决心,才能达到目标。贺瑞麟为学不务虚名,他认为读书人应当做的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儒者之所为也。”^{[1]890}贺瑞麟一生笃信程朱理学,立足于解决现实问题,走出现实困扰。他一生兢兢业业,刻苦铭志,力扶正学,使程朱之道复明于世,是他毕生所向,但终未能达成心愿,收效甚微。

3 贺瑞麟德育思想的当代价值及其局限性

贺瑞麟德育思想对当代社会仍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首先,可以提高当代人的孝德认识。自古以来,孝就是正己化人的出发点。将人的孝心激发出来,然后再引导其推而广之,去尊敬和关爱其他的人,从而构建和谐的社会风尚。孝敬父母绝不是一件小事情。一个人,如果连养育自己的父母都不关心、不照顾、不尊敬,怎么能去爱他人、爱集体、爱国家呢?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可见,孝是人的第一修身内容,又是家庭和谐、国家稳定发展、凝聚人心的基础,仍有其继承推广的价值。

其次,加强诚信行为引导,强化示范效应。程颐指出:“学者不可以不诚,不诚无以为善,不诚无以为君子。修学不以诚,则学杂;为事不以诚,则事败;自谋不以诚,则是欺其心而自弃其忠;与人不以诚,则是丧其德而增人之怨。”(《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五)贺瑞麟恪守程朱,把诚信看作是比生命还要重要的东西,他严格要求自己,一言一行都不失信于人。他在教导学生时也是从日常生活的点滴要求学生诚信。比如,“有洒扫与隐蔽处不到者,先生曰此即不忠信也”。^{[1]979}他在接受知县余赓阳邀请处理陕西灾后事宜时,不仅没有假公济私,反而在此期间均不受薪水。贺瑞麟诚信品德和思想对我们今天的诚信教育仍具有示范效应。

第三,挫折是一种重要的教育资源。人生之中的挫折无可避免,关键是我们采取何种态度去面对它。如果不能正确认识挫折的作用,提高挫折承受力,那么我们就很难做到在挫折面前应付自如,保持心理平衡。贺瑞麟在经历了痛失双亲、中年丧子、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惨人生后,不悲观不抱怨,以常人难以理解的意志坚守自己的理想,体现了孟子所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的人生境界。于当代

人来说,比古人的生活条件要好上千万倍,很少有艰辛生活的磨练经历。然而,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大凡成就一番大事业的人,都是经得起苦难洗礼的人,所以挫折是一种很好的教育资源。

第四,女德教育。虽然《女儿经》中的有些思想已经“过时”,但我们亦应看到贺瑞麟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认识到女子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是难能可贵的,他意识到知识相比较于“嫁妆”对女性的价值更大。贺瑞麟所著的《女儿经》,其中有不少内容,我们稍作变通,在今天仍不失其价值。

第五,注重公民的励志教育。贺瑞麟指出:“夫子自言十五志学。是圣人当十五岁时,便有希天底志向,到得从心不踰矩,与天合德,不过是遂其志耳。可见学者先要立志。学者志不立,虽读书终是隔膜。”^{[1]963}贺瑞麟认为读书人如果没有远大的志向,即使读书也终将学无所成,只缘于从一开始就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为了读书而读书。墨子有句名言:“志不强者智不达。”(《墨子·修身》)正是明白立志在人生中的重要作用,贺瑞麟花费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来刻朱子书,刻蒙学书,为的也是自己唯一的志向:将程朱理学发扬光大。“吾恐吾志不立,将不得望孔、孟、程、朱之门;吾恐吾敬不居,将有负于天地父母之身;吾恐吾理未穷,则无以格物致知而有尽心知性知天之乐;吾恐吾身未反,则无以为诚正修齐治平,而功德言皆有不立之忧。四者乃朱子一生为学之要旨,而先生一身肩之。”^{[1]1171}贺瑞麟将居敬穷理作为自己毕生的追求,虽然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充满了艰难困苦,但是他都不忘初心,一往直前实现自己的目标和志向。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人们在面对挫折时表现出更多的是心灵的脆弱和意志品质的薄弱。因此,加强对当代人远大志向和坚韧道德意志的培养和锻炼,是解决现代人“玻璃心”的有效途径。

我们在肯定贺瑞麟德育思想价值的同时,也要充分认识到贺瑞麟德育思想的局限性。首先,崇古复古思想缺乏科学性。贺瑞麟一生居于关中一隅,缺乏远足的经历。贺瑞麟认为“程朱之学真得孔孟以来相传之心法,其所以致力,则必以居穷理为纲要。某于是摒去世俗之陋,而一惟程朱是守”。^{[1]1073}贺瑞麟不仅尊崇程朱,更是提倡述而不作。“朱子道理熟,一转移间便成千古不朽之书。其实实用前人话,未曾出一语,真是述而不作。”^{[1]936}历史可以借鉴,但不必原封不动地回到过去的模式,通过复古解决

问题的思路也是不科学的。而且,贺瑞麟当时所处的社会思潮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西学东渐以及新学的兴起都充斥着晚清的时局,贺瑞麟为学仍持门户之见,“此为学先要辨别路途门户。今人讲学者动谓不可有门户之见,便见不是真心向圣贤路上来,若真心为圣贤,岂可不寻圣贤真门户”。^{[1]864}又说“世儒有不分门户之说,只缘孔、孟之学大中至正,已立下万世底门户。学者再不许错走。孟子曰,‘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闲者,防藩之意,亦是恪守门户。若以不分门户为高,将混老、佛、儒、墨为一,则是邪说。不必息讹行,不必拒淫辞,亦不必放也,成甚么学术。”^{[1]907}其思想缺乏学术的兼容性和开放性,自身思想理路对程朱过于纯粹,而缺乏创新性和开放性,就注定了贺瑞麟终不能开拓出一条通往新世纪的道路。

其次,对待西方文化态度存在落后性。近代以来,理学家们仍然用“内夏外夷”的观点看待中国与世界,理学营垒中的拒外者拒不承认中国有落后于人的地方,他们开出使中国强盛的药方就是通过加强封建道德教化来恢复清王朝昔日的“盛世”局面。^{[8]166}作为理学捍卫者的贺瑞麟则把中国在“开关”以后发生的变化看成是正在经历着“以夷变夏”的历史悲剧,对此痛心疾首:“今日洋务,此事大关世变,中外大闲已驰,不知后更有甚事出来。我中国不但变唐虞三代之局,且正受汉唐宋明之局。千古未有者,今皆有之,奇异日兴,伊于胡底,杞人私忧,何日能已。要之,总由正学不明,人事不立,三纲五常,几无人讲,几何不为夷狄禽兽之归耶?可胜叹哉!”^{[1]844}与西方事物势不两立,甚至他的学生更是固执到连“洋物”都发誓不用的地步。这种对待西方文化的方式无异于“居神农氏之世,而茹毛饮血;居黄帝之世,御蚩尤之暴而徒手搏之”。^{[9]157}这样的结果只会束缚住头脑,使人们采取盲目排外的立场,最终会导致作茧自缚、丧失良机的严重后果。

贺瑞麟弟子牛兆廉评价贺瑞麟说:“信小学、四书如神明,遵横渠熟读成诵之说,严为己为人之辨,于心术隐微之际,反躬克己,学如不及。其日用伦常,自洒扫应对,以至冠婚丧祭,造次必以礼法,俾先王遗教,彬彬然见诸实行。”^{[1]1176}其一生以研理弘道为己任,以授徒解惑为业,学行优赡,清介不取,“上承洙泗,下启洛闽,绵圣传于不坠,振道统于中兴”,^{[1]1119}将一生的心血都花费在教育事业上。贺瑞麟的德育思想是生活式德育,他评价人才的标准是取德而轻才,注重培养学生的德育。贺瑞麟鄙弃科举考试,他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在日常生活中以自己的言传身教感染学生,重视对学生进行感恩教育、品行教育、挫折教育、立志教育。其讲学甚久,故造就尤众。清末陕西著名大学者蓝田牛兆廉、兴平张元勋、蒲城米岩、山东淄川孙乃琨等等都皆出其门,其创办的正谊书院在当时声名远扬,外来求学者络绎不绝,省内外所教弟子数以万计,当之无愧地堪称一代理学之大师。我们在评价贺瑞麟时,应该站在历史的角度,对其德育思想以正确的评价。

参考文献:

- [1]王长坤,刘峰,点校.贺瑞麟集[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
-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3]刘学智.关学思想史[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
- [4]黑格尔.历史哲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 [5]张锡勤.中国传统道德举要[M].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8.
- [6]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7]贺瑞麟.西京清麓丛书[M].传经堂刻本.1894(光绪二十年).
- [8]史革新.晚清理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 [9]薛福成.薛福成选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